

孙犁先生的“签名本”

■侯军



上图:1994年夏作者夫妇去孙犁寓所拜访时与孙犁的合影。
右上图:《铁木前传》扉页上孙犁的名章和他最喜欢的藏书票。
右下图:《老荒集》上孙犁的题签。

上个月接到天津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的来信,随信寄来一本海燕出版社新版《书衣文录》。刘先生在信中说,“今年是纪念孙犁逝世十五周年,我又编了一次《书衣文录》。不敢说全了,我想再有也不会多了。”

刘先生已年逾八旬,多年来苦心孤诣,辛勤搜求孙犁先生散落各处的佚文,已为孙犁先生编了几十本书。前些年,他曾找我征集过孙犁先生写给我的几封信,并编入了新版的《芸斋书简》。

这本新出的《书衣文录》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:牛皮纸封面是空白的。刘先生在信中说:“这本书的书名要自己写。”再翻开扉页,用仿真度极高的蓝墨水印着两个钢笔手迹“孙犁”——显然,这是为那些酷爱孙犁“签名本”的书迷们特意设计的。

由这个印上签名的“签名本”,我不由得想到我与孙犁先生的多次交往,想到我有幸得到先生诸多“签名本”的故事。

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。那时我刚到《天津日报》担任农村部记者,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,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,说:“瞧,那就是孙犁。”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,却只见到一个背影,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、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。

1984年,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。当时副刊上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,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,就草拟了一篇《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》的论文提纲,打算寄给孙犁先生过目。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,我还斗胆对《孙犁文集》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,提出了不同意见。这封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编辑张金池转交的,老张也曾参加过《孙犁文集》的编纂工作,一听说我对文

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,就善意地提醒我说,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,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,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批评孙犁先生啊!我听罢暗暗后悔,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。

两天后,老张给我打来电话,说孙老回信了,让我到文艺部去取。我赶去一看,岂止是回信,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《老荒集》,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——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。更令我惊喜的是,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,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,他写道:“读过你的来信,非常感动。看来,青年人的一些想法、思考、分析、探索,就是敏锐。我很高兴,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。这并不是说,你在信中,对我作了一些称许,或过高的评价。是因为从这封信,使我看到了:确实有些青年同志,是在那里默默地、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,研究一些实际问题。”(见孙犁《无为集》)。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,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。

此后,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了起来。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,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,分配给我一个课题,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,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。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,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。在动笔之前,我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,请教几个疑点问题。当天下午,孙犁先生就给我写了回信,而且是用毛笔竖写的,书法秀润清新,一共写了四张稿纸,回答了七个问题。我把握不准的疑点全都迎刃而解了。

我把那篇论文的题目定为《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》。我写得用心,力求做到考

证精审、立论有据,洋洋万余言刊发在《新闻史料》上。孙犁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,当即给我写来一信:“昨日见到《新闻史料》,当即拜读大作论文。我以为写得很好。主要印象为:论述很广泛,材料运用周到。实在用了功夫,很不容易。衷心感谢!”这封信后来刊登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上。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,孙老从不轻易表扬人,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的话,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。

1992年冬,我决定南下深圳,临行前想向孙老知会一声。我请孙老的女儿孙晓玲帮我联系好时间,依时前往孙老家拜望。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,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。我吃惊地发现,几个月没见,孙老消瘦了很多,满面病容。我对孙老说:“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,也不敢来打扰,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。您应该早点去医院看一看呀!”

“我不去医院,”孙老口气异常坚定,“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。”

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,正想说南下的事情,孙老却先发一问:“侯军啊,最近怎么没见你写东西呀?”

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,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。确实,自打决定南下,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。见我不言语,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:“我也知道你忙,负一点责任就更忙,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。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,就算个文人了。我常说一句话:文人当以文章立命。你还年轻,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,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,有多么重要了。”

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

9月25日的《文汇报》刊发了徐正纶先生写的《汪曾祺先生九封未发表的信——关于〈晚翠文谈〉出版的前前后后》。文章非常有趣,让我想起2011年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的为编辑“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”作准备的一个座谈会。那次会上曾因文字校勘问题,发生过争论。与会者分成两派,一派认为原文明显的错字应予以径改,一派则认为应原文照录,错字出校注。问题是,如果原文的错字、错句等全都不改,而是以注释的形式说明,那新编的《全集》版面可能就会不够美观,势必影响读者的阅读,这是出版社很不愿接受的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,出版社或许急于在汪曾祺逝世一周年之际付梓,仓促在所难免,但有些文字、引文错误确实是汪曾祺文章中本来就有的。

那次会上,汪曾祺先生的女儿,记不得是汪明还是汪朝女士了,还曾介绍说,汪曾祺写作,相当随性,需要引用前人文字时,往往凭记忆,因此常常会有错误,如果写的是英文,那错的就更多;他还常写一些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,比如“哑巴”,全是写成“哑吧”的。自然,写个把错别字完全无损于一位大作家的形象,作家写作,不是学者写论文。若是汪曾祺写作,书桌旁还要备一本字典,每句引文还要翻箱倒柜找原文,也就不是我们印象中可爱的、随性的汪曾祺形象了。

但话说回来,汪先生文集的错误,如果发现了,还是应尽量改过来。汪先生去世后,三联书店出过《晚翠文谈新编》,篇幅比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晚翠文谈》略有增删。《晚翠文谈新编》列入“三联精选”文库,非常精致,引人喜爱。其打头第一篇是《美在众人反映中》,然而这标题就不免引起人疑惑。文中汪曾祺感慨于“中外小说里的人物肖像都不精彩”,从而总结出“用文字来为人物画像”的较好的方法,一种是“写其神情意态”,另一种“不直接写本人,而写别人看到后的反映,使观者产生无边的想象”,恐怕是更好的方法。汪曾祺举了三个例子,荷马在《伊里亚特》里,写海伦的美,并未“形容她的面貌肢体,只是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看到海伦的几位老人的惊愕”;《陌上桑》为了渲染罗敷之美,不直接写罗敷长相如何,而写见到她的人的举止,“行者见罗敷,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,脱帽著帩头。耕者忘其犁,锄者忘其锄”;而佛经中为了写释迦牟尼之美,更是夸张了“婴孩对于美的感应”:“抱上婴孩儿,口皆放母乳。熟视观菩萨,忘不还求乳。”这三例中分别见到海伦、罗敷、释迦牟尼的举止,很显然,皆应是“反应”。

汪曾祺在《使这个世界更诗化》中,再度以《陌上桑》写罗敷之

海,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。说话间,孙老拿出一本新出的《芸斋小说》题赠给我。而我却最终也没敢把即将远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。

我南下深圳不久,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,随后动了大手术,胃切除了二分之一。这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,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1994年8月,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一周年之际,我回津探亲,行装甫卸,便急不可耐地跑去看望孙犁先生。

像往常一样,依然是孙老本人前来开门的。只见他面容清瘦,满头银发,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。虽说是大病初愈,走路稍显缓慢,但却十分稳健。落座之后,孙老笑道:“你今天来得真巧,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。去年手术之后,恢复得挺好,现在又能写点文章了。”

那次见面,孙老谈兴很浓,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,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浮躁风气。孙老说:为文的人,只有耐得住寂寞,才能写出好文章,这是一个规律。现在的问题是,大家都坐不下来,整天烦躁不安。在这种心态下,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?不过,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“寂寞为文”这一套,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,许多人不以为然。但是就我个人而言,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“寂寞之道”。

那次畅谈中,我把自己新出的艺术评论集《东方既白》送给孙老指正。孙老则题赠给我一本《孙犁新诗选》,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《孙犁文集》的扉页上签名留念。如今,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“镇宅之宝”。

名家写错别字,改不改?

■杨新宇